

《音韵学方法论讨论集》编辑组 编

YINYUNXUE FANGFALUN TAOLUNJI

音韵学方法论讨论集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音韵学方法论讨论集

《音韵学方法论讨论集》编辑组 编



商务印书馆

200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音韵学方法论讨论集/《音韵学方法论讨论集》编辑组编.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ISBN 978-7-100-05770-7

I. 音… II. 音… III. 汉语-音韵学-方法论-文集
IV. H1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7652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YĪNYÜNXUÉ FĀNGFĀLÜN TǎOLÜNJÍ

音 韵 学 方 法 论 讨 论 集

《音韵学方法论讨论集》编辑组 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5770-7

2009年6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7

定价: 33.00 元

目 录

郭序	1
陈序	4

历史音韵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驳梅祖麟在香港语言学会年会上的讲话	郭锡良 7
音韵问题答梅祖麟	郭锡良 33
梅祖麟《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讲辞质疑 ..	陈新雄 70
论“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	
——兼议汉语研究中的“犬马鬼魅法则”	鲁国尧 92
说“晒”	鲁国尧 107
中国音韵学的性质与目的——从两个“事件”说起	薛凤生 116
王力先生的“谐声说”	唐作藩 130
汉语历史音韵学研究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尊重科学	
——评梅祖麟教授《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等文章	
.....	王宁 黄易青 152
就王念孙的同源词研究与梅祖麟教授商榷	
.....	华学诚 柏亚东 王智群 赵奇栋 郑东珍 175
梅祖麟《中国语言学的传统和创新》商榷	潘柏年 195
梅祖麟《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读后感	曾荣汾 218

2 音韵学方法论讨论集

诸家质梅文述要	何昆益	234
传什么给下一棒——汉语史音韵学接力赛的省思	林庆勋	249
试论跟明母谐声的晓母字的语音演变(一)	孙玉文	263
汉语音韵史与汉藏语的历史比较	耿振生	277
论上古喉牙音向齿头音的演变及古明母音质 ——兼与梅祖麟教授商榷	黄易青	298
建设创新型语言学	节于今	317
“美”字能归入微部吗? ——与梅祖麟商榷	郭锡良	328
《汉语历史音韵学·上古篇》指误	孙玉文	336
上古音构拟的检验标准问题	孙玉文	373
简评潘悟云的《谐声分析与异读》	郭锡良	428
论谐声原则——兼评潘悟云教授的“形态相关”说	耿振生	434
关于《小雅·正月》中“正月”的训诂问题	张猛	475
汉语历史音韵研究之辨伪与求真	周守晋	484
论“谐声”的鉴别及声符的历史音变	黄易青	500
上、去二声源于韵尾说不可信	张雁	515
关于“去声源于-s尾”的若干证据的商榷	李香	528
编后记		539

郭 序

众所周知,五四运动加快了西学东渐的步伐,中国语言学接受西方语言理论的影响已表现很明显,在音韵学领域高本汉的学说也传入了学术界。1923年汪荣宝受俄国学者钢和泰《音译梵书和中国古音》一文的影响,用译音对勘法来研究汉语音韵,发表了《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于是在中国语言学界激起了一场辩论。这是一场音韵学研究方法的辩论,极大地推动了此后汉语音韵学的发展和现代化。杨树达先生曾将讨论文章编辑成册,为查阅参考者提供了很大方便。

到了本世纪初,古音学研究又发生了一场辩论。起因是2001年12月8日梅祖麟在香港语言学会年会上发表了《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演讲,集中攻击了王力先生和王念孙,还扫荡了乾嘉学派、章黄学派及其“旁支别流”,海峡两岸的不少学者都被点了名。稿子贴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网站上,不仅因为它对王力先生的无理攻击,即便是明辨学术是非,我都不得不做出回应,2002年6月27日我在纪念《中国语文》创刊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做了发言,题目是《历史音韵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驳梅祖麟在香港语言学会年会上的讲话》,从而引发了在海峡两岸联合进行的一场学术辩论。

辩论的问题表面是:(1)上古汉语有没有复辅音?(2)王念孙

的“一声之转”是否能用来研究同源词？(3)研究上古音要不要利用汉藏语比较材料？(4)怎样做汉藏语比较？王力先生的古音系统能否用来做汉藏语比较？然而实质上是要不要继承中国语言学自己的传统和如何吸收西方(主要是美国)语言学的问题,也涉及学风和治学态度。

中国和西方有各自的语言学传统。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字,研究汉语的历史音韵,居然有人全面否定中国语言学自己的传统,把文献资料视如敝屣,把对文献资料的考证研究看作保守,这种言论主张对中国历史音韵学的发展是有利呢?还是有害?这应该是很清楚的。

至于在汉语历史音韵学研究中要吸收西方的历史比较法,这是五四以来的共识;王力先生是这方面的积极提倡者,更是最主要和最佳的实践者之一。但是学习西方语言学,重要的是学习他们的理论方法,用来指导我们的汉语研究,而不是邯郸学步,套用他们的研究成果。因此,从高本汉起就是把“历史比较法”和“历史文献考证法”结合起来应用,而不是生搬硬套地死守西方的理论方法。

说到汉语历史音韵研究同汉藏语比较的关系问题,这同对待历史比较法是两码事。汉藏语系是上个世纪30年代由李方桂先生根据语言类型学的条件首先做出论证的假设,却被某些人当作无须证明的大前提来要求上古音《诗经》音系与它接轨,这恐怕是过于主观武断吧。怎样做汉藏语比较,双方自然存在原则分歧。我在答辩的文章中表示完全赞同张琨先生、俞敏先生的看法和李方桂先生在《上古音研究》中的意见;并把梅氏及其同道所错定的汉藏语同源词进行了分析批评,归结为“音隔、义隔、类隔”三种错

误类型。于是又出现了一种托词：“你否定了一百，我还有两百是对的，还是我有理。”

现在《李方桂先生口述史》已经出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李先生在《口述史》中说:“这些语言(指汉藏语)是否有系属关系至今还是问题。”(104页)“我只想知道这门语言的面貌如何,是否把它与别的语言联系起来,那是最次要的问题。”(108页)李先生认为白保罗进行汉藏语同源研究的方式是完全错误的,他说:“我认为那不能称之为方法论,根本不能成其为方法论。”“我认为他(指白保罗,下同)的方法论让人误入歧途。”(93页)“他使用所有的词典,从中抽出许多词汇来,编出了他那本书(指《汉藏语言概论》)。”“把许多东西拼凑在一起,不管对错。”(94页)“我以为所有此类构拟纯属胡闹。”(95页)他还挖苦亦步亦趋跟着白保罗依靠双语词典做汉藏语同源研究的人,说道:“既然本尼迪克特(白保罗)这样构拟,好吧,这就是圣经,这太可悲了。”(95页)我们从来不反对汉藏语比较研究,反对的是李先生所批评的“构拟纯属胡闹”的“汉藏语比较研究”。现在有些搞汉藏语比较的人,不正是打着李先生的大旗,做着李先生反对的事情吗?这恐怕不太合适吧?

辩论已经延续五年,海峡两岸及华裔美籍学者参加辩论者已达数十人,发表的论文已经有数十篇,海峡两岸不少同行都对我说,应该编辑出版这次讨论的文集。我想,真理越辩越明,将双方论文,汇集成册,不无好处。一则方便查阅,是非曲直,任世人评说;二则留个记录,经验教训,有后人记取。是为序。

郭锡良 2006年10月22日于京郊守拙居

陈 序

清儒姚姬传、戴东原皆言：学问之途有三，义理、词章、考据是也。而考据者乃所以吸收中国历史文化之工具，词章者乃所以发表研究之心得是也。中国有久远之历史，有丰富之文化，有优美之文字。而历史文化皆由文字以表达，中国数千年来之经传典籍，无一非由文字而表达，故非文字不足以知中国历史之久远，非文字不足以识文化之博富。是以许慎《说文解字·叙》云：“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我国文字之构造，虽为形符，然其运用，仍在音符。就以构造文字之六书言，谐声一类，十居八九，转注假借，纯由音生。盖文字由语言而来，文字未造，语言先之矣，语言藉声音以表达，方其记录文字之时，文字尚未创造，则借用音同音近之字，暂时替代，此即许慎所谓“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之假借也。中国方言极为分歧，原本一音，由于方言差异，遂造出异字，字虽不同，义实无异，文字统一，加以沟通，此即许氏所谓“建类一首，同意相受”之转注也。无论谐声、假借、转注，无一非以音为用者。然后人常觉难以掌握者，乃因音有古今南北之差异，凭何断定，何字同音，孰为相异？此非凭空想象，所可解决，亦非凭一时一地之方言，所可拟议。故必须有声韵学上之知识，通晓音变之规律，始可运用如意，方能确切掌握。故欲彻底了解古书，明白文字音读，训诂条

例,减少阅读困难,倘不识音韵,则无从作根本解决也。

清顾炎武《答李子德书》曰:“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实乃一针见血之言。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云:“清儒以小学为治经之途径,嗜之甚笃,附庸遂蔚为大国。”又云:“音韵学又小学之附庸也,而清代特盛。”梁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亦云:“小学本经学附庸,音韵学又小学附庸,但清儒这方面用力最勤,久已蔚成大国了。”清代音韵之学,发轫于顾炎武,而集其大成于章炳麟与黄侃。曾国藩《圣哲画像图记》谓高邮王念孙、引之父子集小学训诂之大成,故最能洞识声韵学之宏效。王念孙《广雅疏证·自序》云:“窃以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譬如振裘必提其领,举网必挈其纲。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此之不寤,则有字别为音,音别为义,或望文虚造,或违古义。或墨守成训而赝会通,易简之理既失,而大道多歧矣。”王引之《经义述闻·自序》亦云:“诂训之旨,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中国文化之精华,存于古籍经传子史之中,经传子史之所以值得宝贵,乃在于其所载之道理,而欲明其道理者,无有外乎语言文字者也。故清代三百年来,学者孜孜矻矻,尽在阐明声韵之奥理,此所以音韵学由附庸而蔚为大国也。

顾清儒之治斯学也,往往知其然而犹未识其所以然。如段玉裁为古音学大家,能析“支”“脂”“之”为三,至其音读,终不能得。晚年尝以书问江晋三云:“足下能知其所以分乎!仆老耄,倘得闻而死,岂非大幸!”此则先儒好学之笃,虚己之诚,非有确见,不敢妄定也。直至瑞典高本汉著《中国音韵学研究》及《考订切韵韵母隋

读表》，始以西方语音学理，参以各地方言，及域外译音拟定《广韵》二百零六韵之音读，并进而上推三代古音之音读。传其法者，在中国有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王力、董同龢、张琨、许世瑛诸君，则不但能言其分，且能进求其所以分之故。纵或借用同语族语，或域外译音，亦均临深履薄，未敢任情指斥也。

2002年，余应北京清华大学中文系之邀，为客座教授三月。在北京时，友人寄赠梅祖麟氏2001年12月在香港语言学会年会讲辞《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一文，于章黄学派及王力先生多作污蔑之言，并将鄙人列为章黄学派浩浩荡荡徒子徒孙之首选，梅氏且以语言大师自居，任意指点，主流别派，夜郎自大，气焰高涨，而诬蔑前贤，尤所齿冷。自以略窥藏语，如获至宝，不明前贤治学之方法，不识古人研寻之微旨。弃家鸡而乐野鳧，怪旧艺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遂沾沾而自喜。余得此文时，即将离开北京而返回台北。临行前夕，郭锡良兄持其新著《历史音韵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相示，读后感触良多，因邀请同好并召集门人举办“汉语历史音韵学研讨会”，同时发表《梅祖麟〈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讲辞质疑》一文，其后分别刊登于香港《语文建设通讯》及华中科技大学《语言研究》中。去岁杭州召开“纪念《周礼正义》出版百年暨陆宗达先生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锡良兄谓已将历来所讨论之有关论文，汇集成册，即将交出版社刊行印，嘱余撰一序文以纪其事。因述其缘起如此，至其大是大非，愿与世人共论之。斯为序。

2006年9月20日陈新雄序于美东马里兰州洛克维尔市

历史音韵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驳梅祖麟在香港语言学会年会上的讲话

郭 锡 良

(北京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871)

提要 本文从四个方面批评了梅祖麟教授在香港语言学会年会上的讲话:1. 论述了王力先生如何用谐声系统研究上古音韵;梅氏攻击王力不懂“同声必同部”,是疏于读书使然;2. 对比了王力、董同龢、李方桂三人如何对待古代有无复辅音的问题,指出梅氏杜撰的古音研究中的两条不同路线的说法不当;3. 批评了谐声现象反映上古汉语有形态变化的论调;4. 认为梅氏在他的讲话中有否定传统的倾向;讨论了怎样对待汉藏语比较研究的问题,对梅氏在汉藏语比较中的不科学的做法有所批评。

关键词 历史音韵学 谐声系统 复辅音 同源词 汉藏语比较

从北京大学中文系网站上读到梅祖麟的《有中国特色的汉语

^{*} 本文曾在纪念《中国语文》创刊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2002年6月27日,南昌)上宣讲,载《古汉语研究》2002年第3期。

历史音韵学》，这是他 2001 年 12 月 8 日在香港语言学会学术年会上所作的报告。报告人以音韵学权威自居，拉起了一面“主流的上古音研究”的大旗。梅教授的讲话主要是批王力先生，如果他批得对，哪怕是有某些出入，我们自然应当欣然接受；然而他完全歪曲事实，给王力先生泼了不少污泥脏水。作为王先生的一个学生，不能不为王力先生洗刷一下。梅氏给音韵学指定的一条路，绝非什么主流正道，作为也搞一点音韵学的人，自然不应该怕惹是非而任其贻误读者。这就是我不能不讲一点意见的原因。

一 王力果真不懂“同声必同部”吗？

讲话首先是集中攻击王力先生连段玉裁的“同声必同部”说的重要性都不知道，在自己的研究中不懂得利用谐声字的资料来解决问题。这就是王力先生同李方桂先生、董同龢先生所以分出高下的原因，并煞有介事地举出两个证据：一是王力先生用《诗经》押韵的材料给脂微分部，由于合韵较多，“并不坚持一定要分部”，结果董同龢在《上古音韵表稿》中参考谐声字给解决了，“老师不能证明的学说给学生证明了”。然后轻佻地挖苦讽刺说：“脂微分部的历史说明什么？如果我是王力，在 30 年代研究脂微分部，把南北朝诗人用韵的资料用尽了，把《诗经》押韵的资料用尽了，还是功亏一篑，不能证明脂微两部一定要分，我会想：还有什么资料可以用，用了以后可以把‘脂微分部’这个学说证成？如果我真正体会段玉裁‘同声必同部’的力量，一定会去分析谐声字，不必等董同龢 40 年代的研究，就把脂微分部的问题全部解决。王力先生显然没有如此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没有真正体会段玉裁‘同声必同

部’的力量。”二是“还有旁证”，这就是王力先生的《汉语音韵学》大量地征引清儒古音学的原文，讲段玉裁的古音学那一章征引了六段段玉裁的话，“惟独没有征引的是段玉裁最有名的论‘同声必同部’的那段。”(214页)经他这样一涂抹，王力先生似乎真的不懂段玉裁的“同声必同部”理论，似乎也真的研究古音不知道用谐声字材料。

事实到底怎样呢？我们知道，1937年王力先生发表了两篇音韵学论文：《古韵分部异同考》和《上古韵母系统研究》。它们是互相配合的姊妹篇，也是奠定王力先生古音学基础的两篇重要论文。《古韵分部异同考》就是把谐声偏旁分成三十二类，并将《诗经》入韵的字列在偏旁之下；然后把从顾炎武起到章炳麟、黄侃共十一家（包括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严可均、江有诰、朱骏声）的古韵分部列出，再考察他们各部包括哪些类谐声偏旁和《诗经》入韵字；最后列成《诸家分部异同表》(97页)。王力先生通过考察谐声偏旁及同谐声的《诗经》入韵字来考求诸家分部的异同，目的是为了建立自己的古韵系统，也就是为写《上古韵母系统研究》作准备。这不是用谐声资料来研究古音吗？我不知道批评者是不是读过这篇文章，难道王先生有这样一篇文章也不知道或者忘记了？再说，批评者在讲话中提到了《上古韵母系统研究》这篇文章，其实这篇文章有一小节专谈谐声问题，王力先生在此说：“自从顾炎武以来，大家都知道谐声偏旁对于古韵归部的重要。段玉裁说得最明白：‘一声可谐万字，万字亦必同部。’这一个学说是一般古韵学者所恪守不违的。”(119页)在谈“开合问题”时，王先生说：“稍微研究汉语音韵的人，都知道汉语上古音开合两呼的界限颇严。谐声偏旁属于开口呼者，其所谐的字也常常属于开口呼；谐

声偏旁属于合口呼者,其所谐的字也常常属于合口呼。”(123页)又说:高本汉“断定《切韵》时代有两种‘合口’的[w]”(124页),“我大致赞成高氏的断案,但我比他更进一步,不仅拿《广韵》系统为根据,而且还拿谐声偏旁为根据。凡谐声偏旁,或其所谐之字,后世有变入轻唇音者,在上古即属合口呼;凡谐声偏旁,或其所谐之字,完全与后世轻唇绝缘者,在上古即属开口呼。”还说:如果《广韵》和谐声发生矛盾时,“这是可以牺牲《广韵》系统而迁就谐声系统的。”(125页)后面为上古韵母系统而作的图表,收字排列就是根据《诗经》押韵、谐声字类别和《广韵》系统三个因素来定的。我不知道批评者是不是真的读过这篇文章,如果真的读过,而且读懂了,就不应该作出王力不懂得用谐声字来研究古音的结论。难道只是听别人说过,只是耳食?没有读懂?或者更有别的什么原因?我百思不得其解。

批评者又用所谓“脂微分部的历史”来论证王力先生不懂得用谐声的资料来解决问题时,节录了王力先生的一段话,却把王先生要表达自己观点最重要的话删去了,这里把它补上(删去的话,我们用{}号框起来):

然而我们不能不承认脂微合韵的情形比其他合韵的情形多些,如果谈古韵者主张遵用王[念孙]氏或章[炳麟]氏的古韵学说,不把脂微分开,我并不反对。{我所坚持的一点,乃在乎上古脂微两部的韵母并不相同。假使说完全相同的话,那么,“饥”之与“饑”……其音将完全相等。我们对于后世的脂微分韵就没法子解释。}(189页)

删去后,批评者代王先生下结论说:“换句话说,王力用《诗经》押韵的材料,得到的结论是脂微两部的元音虽不同而相近,并不坚

持一定要分部。”(215页)王力先生不反对别人遵用王念孙、章炳麟的脂微不分的学说,正说明他在学术上的谦虚态度,没有霸气;明明王先生说自己坚持“上古脂微两部的韵母并不相同”,批评者却偏偏要引出王力“并不坚持一定要分部”。我不知道批评者为什么要这样做?批评者嘲讽王先生“老师不能证明的学说给学生证明了”,其实,当时用谐声字划分脂微两部也存在一些纠葛,只是从另一角度说明了“脂微分部说是值得而且必须采纳的”(72页),直到1962年王先生在《古韵脂微质物月五部的分野》中把“隶”声、“惠”声归入质部,把“既”声归入物部,才解决得更好(248页)。30年代王先生考察脂微分部是为了建立他的上古韵母系统,在这篇大文章中他为这一个问题写下了“脂微分部的理由”“脂微分部的标准”“脂微分部的证据”“脂微分部的解释”。方方面面都谈了,王先生无疑是坚信自己已经解决这个问题,合韵多一些,他也作出了现代语言学的解释。他说:“最合理的解答乃是:脂微两部的主要元音在上古时代并非完全相同,所以能有分用的痕迹;然而它们的音值一定非常相近,所以脂微合韵比其他各部合韵的情形更为常见。”(188页)他表示自己不反对别人遵用王念孙、章炳麟的学说,不仅是应有的学术民主作风;何况他写这篇文章时,章炳麟、黄侃都还刚过世,是不是批评者要王先生也像他一样,嘲讽一通章炳麟在《文始》中已经发现了脂微分部的线索,却不懂得审音,因而不能把微部从脂部中分出来?王先生反而在文章中承认自己受到《文始》的启示,这同批评者的态度确实是天壤之别,我想,绝大多数读者是会赞同王先生的。顺便说一下,批评者设想,“如果我是王力”,就会怎么怎么;恕我不客气地说,从讲话可以看出批评者确实自己没有全面弄过谐声资料,对谐声字系统了解得非常肤浅,即使

知道用谐声资料可以证明脂微分部,恐怕也不一定能完成这个课题。

批评者嘲讽王先生不懂谐声资料重要性的旁证是王先生著的《汉语音韵学》没有征引段玉裁论述“同声必同部”那段话;其实,如果真正认真读了《上古韵母系统研究》的话,应该在王先生讨论“谐声问题”的论述中已经找到了答案。我们前面引过的那几句话,就说明了王先生对谐声问题的两个观点:一是谐声偏旁对古韵归部的重要性是从顾炎武起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段玉裁只是说得最明白。我们知道,顾炎武在《唐韵正》中考证古音时就常常从谐声出发。二是“同谐声必同部”对研究古音的人来说已经是一般常识。因此,在王先生看来就没有必要大讲特讲。难道王先生写书也要照批评者的思路吗?大家都知道,顾炎武的《诗本音》创建了诗韵系联的方法,推动了古音研究走上了科学的道路,到20世纪对研究古音的人来说,无疑也是一般常识,难道《汉语音韵学》中还要征引《诗本音》的实例吗?依我看,批评者作为大发现征引的段玉裁的那段话,王先生恐怕倒是会有不同看法的,他可能认为段氏的这段话不严密。因为在《上古韵母系统研究》中讨论“谐声问题”时,王先生还提出了两点意见:一是“同谐声必同部”原则上是对的,但声符的认定还成问题,不能全依《说文》。二是“谐声时代与《诗经》时代不可混为一谈。谐声时代至少比《诗经》时代更早数百年。‘凡同声符者必同部’的原则,在谐声时代是没有例外的,在《诗经》时代就不免有些出入了”。(119—120页)因此,王先生认为,使用谐声资料,不能拘泥于段氏的这个说法。其实段玉裁本人也没有拘泥于自己的这一说法,比如他在《六书音均表》中,把“求”“逖”“球”等都归入第三(幽)部,却把“裘”归入第一(之)部。在这一点